春华秋实润书香

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30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春华秋实润书香

——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30年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华秋实润书香 /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 .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6
ISBN 978-7-5068-5569-3

Ⅰ. ①春… Ⅱ. ①中… Ⅲ. ①出版工作 - 研究机构 - 中国 - 纪念文集 Ⅳ. ①G239.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5751 号

春华秋实润书香——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 30 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

责任编辑 吴　琼
封面题字 刘建华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 vip.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　彩页 2. 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569-3
定　　价 49.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 / 国 / 新 / 闻 / 出 / 版 / 研 / 究 / 院 / 纪 / 念 / 文 / 集

目录

30 年的青春与记忆	魏玉山	1
我与研究院的情缘	黄晓新	7
为总体组同事们画像	张　立	12
回顾与纪念：　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的建立	邵益文	16
人间有味是清欢	余甘漱	33
《传媒》 杂记	李晓燕	41
我的点滴记忆	徐焕生	49
16 年・见证研究院发展	穆桂强	55
“庄里人” 在研究院	赵　冰	61
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姜晓娟	66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印刷研究所诞生与成长	张羽玲	71
家园・岗位・平台・舞场	张凤杰	74
行业的　学术的　美丽的	杨驰原	78
感念・坚持・创新	冯建辉	83
行业翘楚　国家智库	卫朝峰	88
研究院的入口	刘建华	93

十年·写在三路居边上 陈含章 97
与青春的学生一起成长 逯 薇 黄逸秋 100
那些年·那些事：挥之不去的回忆 孟怡平 107
我与研究院的“老小孩” 黄立平 113
与《新阅读》有缘 宗 蕾 118
我与《出版词典》的不解之缘 孙鲁燕 123
写给建院三十周年 屈明颖 132
我的青春 由你见证 许 婧 137
忆往昔 看今朝 苏唯玮 141
随研究院共同成长的六年 宋迪莹 144
爱我所做，做我所爱 毛文思 147
我与研究院的十年 李文娟 152
在工作中成长 刘晶晶 157
冰心在玉壶 张文彦 162
我在研究院实习的日子 杨 昆 171
我与研究院共同成长 郝丽美 176
十年磨一剑 冉 然 178
我的一篇编辑手记 牛 超 184
编辑成长记 杨铠瑞 187
庆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30周年有感 李国永 南恒轩 190
编辑工作中的点滴感悟 杨 莹 193
银球舞动书世界 魏羽雁 198
纪念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30周年 顾 萌 204
青春的梦想之帆从这里起航 香江波 208
祝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 袁 亮 214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拟句志庆 赵安民 216
三路居感怀（外二首） 李晓晔 218
双卅巧和弦感言 谷凤荣 21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30 年的青春与记忆

魏玉山

今年，研究院（所）成立 30 年了，俗话说，三十而立。作为一个来院 29 年（1986 年到所）的老职工，可以说见证了研究院发展的全过程，感受到了研究院前行中的艰苦与快乐。我的青春时光也伴随着研究院的成长而逝去。

从居无定所到扎寨三路居

1985 年 3 月，经中央领导批示和劳动人事部批准，已经筹备一年多的中国出版发行研究所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建所初期，办公条件十分简陋，据先我们一年而来的同事说，单位最初在东四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租房办公，旁边就是上级主管机关——国家出版局。现在大家都羡慕四合院，但当时的四合院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冬冷夏热。冬天办公室需要生煤火取暖，夏天用电风扇。1986 年初，研究所整体搬迁到东城区赵家楼北京军区招待所办公。当时租了招待所的

顶层及四楼2间客房，除了办公以外，85、86年新分配来的十几个学生也住在里面，午间休息时楼道中闪动着众多年轻人的身影，有人说像大学下课一样热闹。是年7月，我是从东四南大街85号国家出版局出发，沿着东四南大街——西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赵家楼，步行到单位报到的，由此成为研究所的一分子。赵家楼在现代史上有很高的知名度，1919年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火烧赵家楼就是这个地方，只不过原来的“楼”已经没有了。在赵家楼办公不到两年。

（第四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1987年末，单位又搬到朝阳区西坝河一个新建成的幼儿园办公。两层楼高，加上一个不小的院子，办公条件大大改善，我们住到了为孩子们准备的宿舍，男生一个宿舍，女生一个宿舍，好像回到了大学时光。当时的西坝河还比较荒凉，三环也没有修好，附近的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刚刚建成不久，展览不多人气也不旺。晚上寂静的很，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同事们常常坐在二楼的平台上赏月聊天。在西坝河仅仅一年时间。

1988年初，单位再次搬到西城区西绒线胡同，是新闻出版署划拨的办公用房，虽然只有850平方米，且与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共用，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大家心里安定多了。首都发行所是一个内部书店，只对机关团体或一定级别的人员开放。我曾混进去过几次，看到过许多一

般书店见不到的内部发行的图书，包括少量的港台图书。但当时囊中羞涩，也只能看看而已。搬到西绒线胡同之初，限于办公室不够，又在附近的31中学租借了一个小楼，部分用于办公，部分用于单身员工的宿舍。31中学历史悠久，曾经是教会办的，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家。我们租借的办公楼是教会学校校长的住所，木质的地板和楼梯还保留了当年的韵味。我在二楼办公，窗外就是一个小游泳池，夏天，既可以欣赏水中上下翻腾的游泳健将的风采，也可以在午后游上几个来回，好不惬意。在西绒线胡同办公整整10年。

（右一为本文作者）

1998年秋，在新闻出版署领导的关心下，我们来到六里桥，与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共用一个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六里桥办公楼是新闻出版署划拨给研究所的，拥有1200平方米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六分之一产权，比起西绒线胡同，可以说有了较大的改善。六里桥办公楼不仅面积扩大了，办公条件也得到改善，每个人都配备电脑，并建立局域网，可以通过局域网连接到互联网。在六里桥呆了7年，刚到时，办公楼南侧还是一片玉米地，离开时已经高楼林立。

2005年初，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喜迁到丰台区的三路居路。这楼原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据说原来是按照蔬菜

配送中心立项建设的，主体工程完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停下来。研究所领导班子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最终下定决心购买此处用于办公，并得到了总署和财政部的支持。这个办公楼近5000平方米，不仅办公条件大大改进，而且有了自己的食堂，解决了职工的早餐午餐问题。当然，随着事业的发展，人员的增加，现有的办公室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不得不在几处租房办公，不得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了。

从纸墨笔砚到鼠标键盘

研究院（所）多次搬家，最累的当属资料室书刊的打包、搬运、拆包、上架。记得每次搬家前几周，资料室的同事们就开始整理书刊资料，

（左二为本文作者）

其他部门的年轻人有时也要帮忙。书报刊是研究人员重要的生产资料，特别在没有互联网、数据库的年代更是如此。为了写论文，需要查阅资料，需要做卡片、摘抄，需要在稿纸上爬格子。记得刚入职时，单位有一个机房，两台电脑，主要用于翻译图书的选题查重工作。机房要求条件高，有空调，一般人员是不能入内的。另外有一个打字室，使用四通打字机，除

向领导机关报送的文件或是领导的讲话或是重要的文稿，一般的文章是不能打印的。1996 年以后，电脑陆续配备到科研人员办公桌上。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电脑主要用于打字，相当于每个人一个打字机。使用的主要办公软件是 WPS，主要的存储介质是五寸盘、三点五寸盘。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十几张这种软磁盘，可惜没有可以读取的计算机了。1998 年以后，基本可以做到一个科研人员一台电脑，科研人员基本甩掉了纸和笔，用键盘鼠标就可以完成论文写作，到后来许多人离开电脑不会写字了，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2000 年以后互联网有了很快的发展，2005 年以后数字出版顺势而生，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数字资源，很多资料可以在网上查找，特别是百度等搜索以及知网等文献数据库的出现，人们去图书馆、资料室的次数越来越少了，2000 年以后，我几乎没有再去过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也不知所踪了。离图书馆、资料室远，离互联网却越来越近，现在，离开网络似乎不会写论文，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从自己起火做饭到单位建立食堂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刚刚分配到单位时，单位人不多，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吃饭成了员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家在北京的员工，每天上班都带一个饭盒，里面有前一天晚上或当天早上准备的饭菜，中午在单位的电蒸箱统一加热。为了认准自己的饭盒，或是用不同颜色的细绳捆扎或是贴上名字，即使这样，难免也有人拿错，打开一看，不是自己带的饭菜。好在大家吃饭时也是互通有无的，谁带的菜好吃，也会请大家一起品尝。至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单身汉，吃饭更成了问题，在赵家楼、西坝河及 31 中期间，早餐到单位附近的早点摊买点包子米粥之类东西，中饭晚饭成了问题。吃过赵家楼的饭店，但是很贵，吃不起；吃过隔壁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食堂、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食堂，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交一定的管理费不说，还有诸多不便，无奈我们都选择自己起火。为了做饭，每个人买了一个煤油炉子、菜米油盐、锅碗瓢盆等，中午、晚上都自己买菜做饭。在办公室的楼道或宿舍内起火做饭，办公室里氤氲饭菜的味

道及炉火没有燃烧尽的味道。80 年代末，肉蛋米面等凭票供应，没有票是买不到的。肉价很低（当然我们的收入也低），买两毛钱的肉可以炒菜。当时煤油是紧俏商品，不是每天都有的，市里面三个石油商店，一个在灯市口，离我们住的赵家楼最近，一个在交道口，离后来居住的西坝河较近，一个在缸瓦市，离西绒线胡同较近。为了买到煤油，我们最远骑自行车去酒仙桥的石油商店。在西绒线胡同甲 7 号集中办公以后，煤油炉子取消了。先是在首都发行所食堂，后来请送餐公司送餐，虽然解决了自己做饭的问题，但是吃的并不可口。搬到六里桥办公后，单位统一供应午餐，职工不用自带饭菜了。因中华书局的食堂迟迟没有使用，我们先是由送餐公司送餐，每隔一二周换一个公司，以调剂口味，后来在旁边国家统计局食堂就餐，但都不尽如人意。三路居办公楼装修时，建立职工食堂纳入了装修计划，从 2005 年开始，员工们既不需要自己带饭，也不需要送餐公司送饭了，彻底解决了职工的用餐问题。

30 年很快就过去了，回想起 1986 年 7 月初，我冒着酷暑，拎着一个大学时代的书包，大汗淋漓地到赵家楼报到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我与研究院的情缘

黄晓新

一晃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三十岁了，到了她的“而立之年”。三十载筚路蓝缕，几代人栉风沐雨，开启山林，终于迎来了今日的春华秋实。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作为一个新近加入者，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不禁回忆起自己虽不在其中、但与研究院多年来的情缘。

1985 年春，研究院的前身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初建时，我刚刚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的岗位考上母校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我的导师、图书情报学院的孙冰炎教授是该院刚创办的图书发行专业的负责人，加上我的研究方向是读者研究，读者和阅读是图书情报学、出版发行学共同研究的对象。学生时代的我受俄罗斯文学家、目录学家鲁巴金的影响，试图从社会学方面来研究阅读行为，因此而写了几篇这类习作。我向研究所创办的《出版与发行》杂志投了稿，以后《出版与发行》先后发表了我几篇探讨阅读社会学的文章，给初出茅庐的我以鼓励和鞭策。

1987 年冬，我到北京来搞研究生毕业调查，曾专程来研究所，一个同学介绍牵线，我认识了研究所的青年人章宏伟同志，他是浙江温岭人，当时刚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分配来不久，高高的额头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他思想很活跃，身上涌动着改革开放年代的澎湃激情，不满足于现状，总想做点事，我们很谈得来。第一次来所，看到在我们心目中仰望的研究“圣地”，原来屈居于赵家楼那个小胡同，而且还是暂借地，心中不免有几分悲凉。

1991 年 8 月，作者随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刘杲同志在青海考察（右一为本文作者）

1988 年夏，我从武大研究生毕业，听说要被留校任教，我受不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诱惑，“不识抬举”，执意要到校外工作，后被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新闻出版署来人考察相中，到北京当了一名公务员。当我再次来到研究所时，研究所已搬到西坝河一家幼儿园办公，记得当时章宏伟同志和我一样都住在单位办公室里，他用煤气炉子亦或是电炉子弄些饭菜欢迎我，我们一大群年轻人聚在一起热闹了一回，充满了那个年代简单而明亮的快乐。

1993 年 9 月，我被署里选派到坐落于日本东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中心交流访学，回国后曾写了篇《访日随想》发表在《出版发行研究》杂志上，那时研究所已搬到六部口的西绒线胡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内办公。当时《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的主编是吴功伟同志，他曾做过多年的教育工作，人非常热情，他总是鼓励我多写文章、多投稿。在这前后，我认识了杂志社意气风发、喜欢钻研的北京小伙张立，特别佩服他学中文出身、但后来自学计算机技术却十分精道，成为专家。由于年龄相仿，又“臭味相投”，我俩很快成了好朋友。

1994 年秋，我搬到东直门察慈小区居住，魏玉山同志住在我楼下。那时，他的女儿正在牙牙学语，记得是从家乡请来的一位保姆照看她，我几次上下班都在电梯里碰到这保姆抱着孩子，一问，原来是这孩子特喜爱坐电梯，追求由此给她带来的“上上下下的享受”。如今，听说魏家女儿已长成大姑娘，并已赴东洋留学读研究生了，真令人感叹唏嘘。1999 年初，时任文化部市场司司长刘玉珠同志找我策划主编《文化市场实务全书》，其中，书刊市场一节还是请玉山同志撰写的。

1997 年冬，我任新闻出版署市场办一处处长，这时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处承担了上传下达的“快报”“简报”的编写任务，当时的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快报”“简报”要“像雪片一样的飞”，我处还有大量的讲话、总结、报告、新闻等的起草任务，还要与中央各新闻单位广泛联系、组织记者采访等等，人手少、事务多、任务重，经署领导协调，抽调一批下属单位得力的同志来我办帮忙。其中，研究所的赵从旻同志借调到我处，从旻同志在我那里发挥重要作用，她协助我起草报告，对 1997 年颁布的新《刑法》中关于查处非法出版活动和盗版的适用条款的不明确提出意见和建议，经署老领导、全国政协委员刘杲等同志的

1999 年 10 月，与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和时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领导余敏、郝振省、宋英亮等同志合影 （右三为本文作者）

呼吁，又经高层领导的协调沟通，我们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多次协商、研讨，最终促成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填补法律漏洞。当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转业的空军记者荣庆祥同志也临时安排在我处帮忙、待分配，记得他一边工作、一边和我讲了好多在部队采访中的奇闻轶事，给我们当时忙碌的工作增添许多轻松和欢快。

1999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桂晓风副署长应时任党委书记、副所长余敏同志的邀请，在市场办负责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已搬到六里桥的研究所调研，我也带处里的同志混迹其中。呵呵，这场座谈和联欢好像是“蓄谋已久”的，座谈过后，我们和所里同志又唱啊、跳啊，大家都难得地放松，既沟通了工作，又交流了感情。当时所里的郝振省副所长、宋英亮副书记也一改往日的矜持，出面“与民同乐”，使大家看到领导同志们的“另一面”。之后不久，我还与郝振省副所长成了安贞桥胜古家园的上下楼的邻居。

2011 年至 2013 年，我自愿赴疆挂职工作三年，去之前，我向领导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即我长期在机关做出版物市场的监管工作，清市场，办案件，破坏不法分子的“有生力量”，得到很大的锻炼，援疆回京后希望换做点新闻出版发展繁荣的工作，以使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到疆后，正好碰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定要编辑出版大型文献丛书《新疆文库》，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主要领导即根据我所学，让我具体组织实施并参与主编《新疆文库》出版工程，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通过这一工作，的确让我无论是从历史学、文献学、出版学的专业实践，还是从各民族各方面编辑出版力量、专家队伍的组织领导方面都得到全新的锻炼。三年的时光没有虚度，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新疆文库》编辑出版的良好开局也得到领导和各方面专家的充分肯定与好评。新疆给予我众多荣誉，包括评我为“优秀援疆干部人才”，又为我记二等功，还经总局同意提拔我的职级等，我感念新疆，感恩组织。

2014 年 8 月，我援疆工作结束回京，总局领导找我谈话，嘱托我要继续协助新疆把《新疆文库》编好，拟安排我到研究院任职，我毫不犹豫一口应承。因为这是组织的信任与重托，也完全符合我献身新闻出版、干点具体实事的初衷和理念。

就这样，我加入了研究院的队伍。我常想，冥冥之中也许有某种感应，经过多年的友情发展，使我终于能成为研究院光荣的一员，与新老朋

2015 年 2 月 13 日，作者带领我院口述出版史工作团队拜访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同志（左起冯建辉、翟丽凤、宋木文、黄晓新、庞元、尚烨）

友们一道共事。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三十年来，在总局的领导下，在各兄弟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几代人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研究院各项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 2010 年“所改院”以来，不论是办公条件、科研经费，还是人才队伍、科研成果，都和往常不可同日而语。我虽加入研究院迟晚，但因为交往和情缘，作为旁观者，也算是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她三十年的艰辛历程和发展轨迹。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不能忘记研究院在初创时期那些艰苦难忘的岁月，不能忘记那些为我们挑水栽树的前辈和先贤……

作为一个长期为研究院“敲边鼓”的后来“加入者”，我当惜福知命，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和全体同仁一道，服务大局，用心敬业，脚踏实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闻出版新型智库”，竭尽全力跑完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里程，书写研究院新的辉煌。

为总体组同事们画像

张　立

一晃30年过去了，用两鬓飞霜已不足以形容岁月留痕。头发花白，双眼微眯，逝者如斯，内心还真有一种戚戚焉！

值此30周年之际，诸多回味，杂陈在胸。留点什么给这30周年做纪念呢？就说说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总体组的这些年轻人吧！

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是写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的重大科技专项。2007年6月，启动可行性论证；2009年3月，总署党组确定研究院（所）为工程总体组牵头单位；2010年2月，总体组在机械大厦租用专门的办公场所，开始独立办公；6月，工程总体技术方案和分包方案通过评审；2011年1—3月，在公开申报基础上，总署重大办组织四次商务谈判，确定分包承担单位和分包预算，总金额1.96亿元，参与单位24家，共有18个分包、26个课题；2011年7月25—27日，总署召开工程研发启动大会，工程研发工作正式开始。截至2015年11月，工程已陆续进入初验评审环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